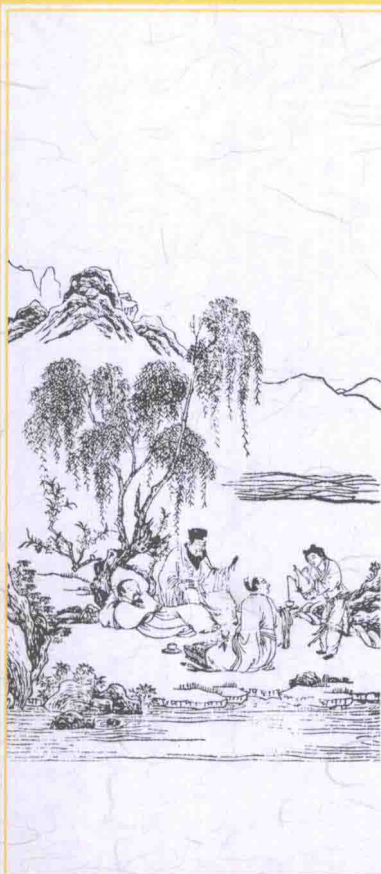


唐宋八大家



罗斌 主编 第四卷

吉林出版集团
有限责任公司



第四卷 罗斌 主编



唐宋八大家



吉林出版集团
有限责任公司

苏
轼
卷

苏轼简介

苏轼（1037—1101），字子瞻，又字和仲，号东坡居士，汉族，北宋眉州眉山（今属四川省眉山市）人。北宋著名的政治家、文学家、画家、书法家。

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其诗题材广阔，清新豪健，善用夸张比喻，独具风格，与黄庭坚并称“苏黄”。词开豪放一派，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，并称“苏辛”。有《东坡七集》、《东坡易传》、《东坡乐府》等。

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、道并重。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，都是兼从文、道两方面着眼的。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，如“精金美玉，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，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。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，文理自然，姿态横生。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，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，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“弥望皆黄茅白苇”般的荒芜。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。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，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、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。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，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。

后杞菊赋（并叙）

天随生自言常食杞菊。及夏五月，枝叶老硬，气味苦涩，犹食不已。因作赋以自广。始余尝疑之，以为士不遇，穷约可也。至于饥饿嚼啮草木，则过矣。而予仕宦十有九年，家日益贫。衣食之奉，殆不如昔者。及移守胶西，意且一饱。而斋厨索然，不堪其忧。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。扪腹而笑。然后知天随生之言可信不谬。作《后杞菊赋》以自嘲，且解之云。

“吁嗟先生，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？前宾客之造请，后掾属之趋走。朝衙达午，夕坐过酉。曾杯酒之不设，揽草木以诳口。对案颦蹙，举箸噎呕。昔阴将军设麦饭与葱叶，井丹推去而不嗅。怪先生之眷眷，岂故山之无有？”

先生听然而笑曰：“人生一世，如屈伸肘。何者为贫，何者为富？何者为美？何者为陋？或粮核而瓠肥，或梁肉而墨瘦。何侯方丈，庾郎三九。较丰约于梦寐，卒同归于一朽。吾方以杞为粮，以菊为糗。春食苗，夏食叶，秋食花实而冬食根，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。”

【鉴赏】

根据本赋“小叙”而“予仕宦十有九年，家日贫”推算，作此赋时苏轼已年过四十，任密州知府，这年密州疾疫流行，蝗虫成灾，百姓生活苦不堪言。

“东南至于江海，西北被于河汉，饥谨疾疫，靡有遗矣”（苏轼《密州祭常山文》）。“何人劝我此间（密州）来？管生尘甑有埃。绿蚁（酒）沾唇无百斟，蝗虫扑面已三回”（苏轼《次韵刘贡父李公泽见寄二首》之二）。

在这期间，时任密州知府的苏轼“朝衙达午，夕坐过酉”。酉，酉时，相当于下午六七点。他在州衙内办公，从早上一直到下午六七点才结束，为处理救灾事物不辞劳苦。在个人生活上，太守也食草木以充饥。太守苏轼与通判刘廷式“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”，目的是充饥，用这种说法不过是为了自己诓骗自己的肚皮罢了，完全没有陶渊明《饮酒》一诗中那种悠然自得的心情。州府的斋厨索然，不设杯酒，即使弄到一些“麦饭葱叶”等粗茶淡饭，苏轼一想到灾民的饥饿痛苦，也“对案颦蹙，举箸噎呕”，难以下咽。这都说明苏轼艰苦朴素，勤政爱民，居官廉洁。这一方面表现了苏轼高尚伟大的节操，正如王国维在《文学小言（六）》中所说“三代以下的诗人，无过于屈子、渊明、子

美、子瞻者。此四子者，若无文学之天才，其人格亦自足千古”。

另一方面，也说明知州、通判都已经以草木充饥，那么平民百姓的饥饿痛苦就更加严重了。本赋中心思想，不仅是为了抒写官员吃草木充饥的清贫，而且道出了万民饥寒交迫的痛苦，“以讽朝廷政事缺失及新法不便之所致”。矛头直接指向实施过于偏激而又与民情不符的“新法”。苏轼并不绝对地通盘否定新法，但对新法过激以及推行不力所造成的弊病是不为人称赞的，特别是在密州这样的灾区，更不适合急于推行。

从写作手法来看，此赋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：

一、从文体上创新，不落旧赋窠臼。本赋使用“自问自答”的方式，一开头就大气磅礴，引人入胜。这说明苏轼不沿袭旧赋“习根”，勇于创新，独步新径，不随波逐流，因此他能创造出最新最美的作品。

二、曲笔隐晦，婉转嘲讽。苏轼的思想是复杂的，又是矛盾的，一方面他感到仕途坎坷，前程无望，愿归田园；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壮志难酬，愿为君为民做番事业，即使官场风波再险恶，生活再贫苦，打击再沉重，也不悔恨，这是由他复杂矛盾的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所决定的。苏轼的处境常使怒骂寓于嬉笑，嬉笑同于痛哭，苏轼写此赋时已不能激情挥洒，直抒胸臆，只好采取“曲笔”，隐忍婉转而嘲讽，事实上是借自嘲以嘲“新法”的“不便”，借自讽以讽“朝廷政事”的“缺失”，随之又在无可奈何之中自嘲自苦。

三、典故运用恰到好处。一般来说，赋不离典，不过用典过多又会太过空洞无物。而本赋用典恰到好处，并不会因用典太多而显得过于华而不实。本赋一共运用了七个典故。第一段用了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，沛王刘辅等五王宴请井丹，丹不去，信阳侯把他骗了过去，丹推去粗茶淡饭而大吃丰盛的酒肉的典故。反其意而用之，反衬出两人思想境界的巨大差异。第二段用了六个典故：

“糠核瓠肥”，典出自《史记·陈丞相世家》“梁肉墨瘦”，典出自《太平御览》卷三十八。苏轼用这两个典故说明饭菜不在于好坏，为自己吃糠咽菜而开脱。“何侯方丈”，典出自《晋书·何曾传》。何曾面前一丈见方的桌案上都摆满了美味菜肴，却不知要吃什么。“庾郎三九”典出自《南史·庾杲之传》，苏轼在这里用这两个典故说明不论丰约贫富，都不免一死，“同归于一朽”。“西河、南阳之寿”指长寿，用来说明以杞菊充饥，兴许还会长命百岁呢！本赋用典得当，使人感到恰到好处。

本赋题为《后杞菊赋》，而苏轼并未作过《前杞菊赋》，那么“前赋”指的是什么呢？“叙文”告诉我们是天随生（陆龟蒙）的《杞菊赋》。苏轼以往锦衣玉食，是无法了解贫民饿食草木的苦状的，认为陆赋写得太言过

其实了。只有当他亲自食杞菊以充饥的时候，才能相信陆赋并未夸大其词。这段话是有讽喻意义的。苏轼的“后赋”如果当朝执政者看见，由于他们高高在上，花天酒地，正在洋洋得意地认为所谓“新法”能够富国强兵，哪里知道千万灾民草木裹腹，奄奄一息呢！他们对苏轼的看法定会像当年苏轼对陆赋的看法那样，认为写得太言过于实了！苏轼写这“叙文”的目的在于用自己对陆赋看法的变化，暗喻当朝执政者要正确客观地对待自己这篇赋，以免加害于自己。

后赤壁赋

是岁十月之望，步自雪堂，将归于临皋。二客从予，过黄泥之坂。霜露既降，木叶尽脱，人影在地，仰见明月。顾而乐之，行歌相答。

已而叹曰：“有客无酒，有酒无肴；月白风清，如此良夜何？”客曰：“今者薄暮，举网得鱼，巨口细鳞，状似松江之鲈。顾安所得酒乎？”归而谋诸妇。妇曰：“我有斗酒，藏之久矣。以待子不时之须。”

于是携酒与鱼，复游于赤壁之下。江流有声，断岸千尺，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。曾日月之几何，而江山不可复识矣。予乃摄衣而上，履谿岩，披蒙茸，踞虎豹，登虬龙，攀栖鹘之危巢，俯冯夷之幽宫。盖二客不能从焉。划然长啸，草木震动，山鸣谷应，风起水涌。予亦悄然而悲，肃然而恐，凜乎其不可留也，返而登舟，放乎中流，听其所止而休焉。时夜将半，四顾寂寥。适有孤鹤，横江东来，翅如车轮，玄裳缟衣，戛然长鸣，掠予舟而西也。

须臾客去，予亦就睡。梦一道士，羽衣蹁跹，过临皋之下，揖予而言曰：“赤壁之游乐乎？”问其姓名，俯而不答。呜呼噫嘻！我知之矣。畴昔之夜，飞鸣而过我者，非子也耶？道士顾笑，予亦惊寤。开户视之，不见其处。

【鉴赏】

此赋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（1082），两赋相距三个月有余。“十月之望”，点出文章写于初冬季节。“霜露既降，木叶尽脱”，黄州一派刚进入冬天的景象。苏轼由雪堂出来，回到住地临皋亭的路上，月夜人影，行歌相答，十分高兴，“有客无酒，有酒无肴，月白风清，如此良夜何？”如此美景，引起了作者复游赤壁的兴致。李扶九评论说：“闲闲叙起，不必定游赤壁，不必定约某客。‘乐’字伏后。仍用‘风’、‘月’二字，乃长公一生襟期。已引

起游意。”（《古文笔法百篇》，下同）《后赋》仍用“风”、“月”作为线索，贯穿始终。此为“一线穿成”笔法。客人提出在江中打鱼为肴；苏轼谋酒与妇，妇更凑趣，“于是携酒与鱼，复游于赤壁之下”。

“江流有声，断崖千尺，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。”融情于景，借景抒情，字字若画，凄凉感人。“曾日月之几何，而江山不可复识矣。”用双关的写作方法，寓意颇深。从字面上看，是写从七月到十月，因为秋冬季节的变化，江山景色已与之前大不相同，真是时变景迁，往昔不在。实际上深寓“讥当时用事者”（《三苏文范》引文衡山语）之意。据毕沅《续资治通鉴》所记，元丰五年（1082）九月、十月，宋神宗在西部发动的开边战争中惨遭失败，损失惨重。统帅徐禧在横山修建永乐城，刚竣工，西夏大军兵临城下，切断水源，城中将士“渴死大半”，最终城门沦陷，宋军全军覆没，死者大概六十万人。宋神宗本人也抑郁而终，大宋王朝此后一蹶不振，失败惨状，目不忍睹，满目疮痍。这正是“江山不可复识”的真意所在。

苏轼游兴渐浓，于是弃舟登岸，更加全面地欣赏赤壁的美景。山岸上的冬夜奇景，描绘形象逼真：“履岩，披蒙茸，踞虎豹，登虬龙；攀栖鹘之危巢，俯冯夷之幽宫”，山岸上崎岖险峻，这表面是苏轼在登山，也正好象征了他仕途的坎坷不平啊！继而描写“草木震动”、“风起水涌”，阴森险恶的环境，令人感到悲、恐，产生“凜乎其不可留也”的想法。这阴森险恶的江岸正是苏轼在黄州生活的真实缩影，苏轼谪居黄州多年，受尽了世间的屈辱和辛苦，他总希望早日离开此地重返朝廷，但现实却很残酷。无奈之中，只好登舟中流，任其漂荡，“听其所止而休焉”。

既然现实中不可能，只好在“梦鹤幻境”之中，凭借道家“羽化升仙”来得到解脱。可是梦醒之后，“开户视之，不见其处”。“岂惟无鹤无道士，并无鱼，并无酒，并无客，并无赤壁，只有一片光明空阔”（《古文观止》评语）。好个“只有一片光明空阔”！犹言：只有一片缥缈虚无的老庄哲学——一部虚幻的《南华经》。采用“梦幻”的手段，在“仙化”中展现哲理，是本文巧妙的艺术手法之一。

前后赤壁赋写于同一年，中间仅仅相距三个月，是各有千秋的姊妹篇。前赋所描写的，限于舟中，后赋视觉转化到了岸上；前赋着重描写秋色，后赋重心偏向描写冬景；前赋主要谈玄说理，后赋则侧重写景叙事；前赋主调乐观旷达，后赋则略显虚无缥缈。《古文观止》评语：“前篇写实情实景，从‘乐’字领出歌来；此篇作幻境幻想，从‘乐’字领出叹来。一路奇情逸致，相逼而出，与前赋同一机轴，而无一笔相似。”

黠鼠赋

苏子夜坐，有鼠方啮，拊床而止之，既止复作。使童子烛之，有橐中空。”嚅嚅有声，声在橐中。曰：“嘻！此鼠之见闭而不得去者也。”发而视之，寂无所有，举烛而索，中有死鼠。童子惊曰：“是方啮也，而遽死耶？向为何声，岂其鬼耶？”覆而出之，堕地乃走，虽有敏者，莫措其手。

苏子叹曰：“异哉！是鼠之黠也。闭于橐中，橐坚而不可穴也。故不啮而啮，以声致人；不死而死，以形求脱也。吾闻有生，莫智于人。扰龙伐蛟，登龟狩麟，役万物而君之，卒见使于一鼠；堕此虫之计中，惊脱免于处女，乌在其为智也。”

坐而假寐，私念其故。若有告余者曰：“汝惟多学而识之，望道而未见也。不一于汝，而二于物，故一鼠之啮而为之变也。人能碎千金之壁，不能无失声于破釜；能搏猛虎，不能无变色于蜂蛰：此不一之患也。言出于汝，而忘之耶？”余俯而笑，仰而觉。使童子执笔，记余之作。

【鉴赏】

这篇文章是一篇寓言式的咏物小赋，借具体事件，转而展开评论思考人生，文笔幽默风趣，结尾寓意深刻，和苏轼其他文章相比别具一格，相传是苏轼十一二岁的作品。

首段描写了一只狡猾的老鼠装死骗人最终逃脱的故事，生动，形象，引人入胜。在一个夜里，一只老鼠正在欢快地咬东西，苏轼拍床想惊吓它。但是仅仅过了一會兒，又听到了老鼠咬东西的声音，就叫童子点燃蜡烛察看具体情况，原来声音是从一只装食物的口袋里传出的，把打开袋子一看，里面却是一只死了的老鼠。童子惊讶地说：“这只老鼠刚才还在咬东西呢，怎么这么快就死了呢？难道是鬼魂吗？”于是把死老鼠从袋子里倒在地上，谁知它迅速跑开了！即使最敏捷的人，也会有措手不及的时候。

此段写作者感叹人被鼠骗。由于口袋很结实，它咬不出洞来，只好假装在咬东西，发出声响，从而惹人注意，当人打开口袋时，它又马上装死，借此逃脱。寥寥数字充分写出这只老鼠的狡猾、聪慧。接着作者又说，在生物中，人类在所有生物中是最聪明的，人能够做万物的主宰，却被老鼠的诡计而蒙骗，致使老鼠逃脱。既然这样，人又怎能算得上最聪明的呢？作者在此处提出了一

个发人深思的问题。

本段着重以感叹的方式抒情，首先结合前段内容，感叹老鼠之“黠”，接着写人的聪明智慧，“说到人之智，引‘扰龙’四事为证，落想难得如此之奇”（林西仲语）。相传夏朝的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，以事孔甲。扰，是驯养的意思，《周礼·夏官》：“掌养猛兽而教扰之。”古代有命渔师伐蛟、饮飞斩蛟的故事。春秋时，鲁哀公六十四年在西郊打猎，曾猎取了一只名叫麟的仁兽。以上四件事都是用来说明人是最有聪明才智而出现的。作者之所以以此为例，是因为这四件事比较特殊，做到了例证鲜明而有力，令人信服。最后感叹“人被鼠骗”，不仅突出了鼠的狡猾，而且提出了为何人竟能被鼠所骗的问题，令人深思，并且引起下文。

此处运用了“惊脱免于处女”的典故，语出自于《孙子·九地》：“践随敌，以决战事；是故初如处女，敌人开户，后如脱兔，敌不及拒。”意思是，如同兔子在处女面前快速逃脱那样，狡黠的老鼠在老实人面前逃跑了。

末段表达出寓意：成功来自专心致志，漏洞出自麻痹大意。苏子闭目静坐，深入思考鼠能骗人的原因，答案是：你只是多记了点知识，多学了一点东西，还没有望见“道”呢！就是离“得道”还远呢！此句是文章的关键所在，要是说前两段是记叙和抒情的话，那么这一段便是议论，也就是在记叙和抒情的基础上总结出一番道理，使文章富于哲理性，也更具深意。“不一于汝，而二于物，故一鼠之啮而为之变也”，是说，自己不能集中注意力，看到外物又易分心，因此，当一只老鼠发出咬啮的声响，想诱导你打开袋子口，改变它此时的困难的处境时，你就安坐不下，不得不受其支配了。“一于汝”，是老庄哲学，即“通于一而万事毕”（《庄子·天地》），“一而不变，静之至也”（《庄子·刻意》）。

作者大量运用了老庄的哲学说明问题。这些哲理虽带有浓厚的道家色彩，但对展现“成功来自专心致志，漏洞出自麻痹大意”生活哲理还是十分有用的。作者在理性上再做延伸，于是就安排了四句著名的哲理警句：“人能碎千金之璧，不能无失声于破釜；能搏猛虎，不能无变色于蜂蛰。”意思是说，人有时能打碎一块价值千金的璧玉而面不改色，但是打破了一只不值钱的铁锅却不禁发出惊呼；人有时能与猛虎搏斗，但有时见到蜂蛰就吓得惊慌失措。这四句，是其十来岁之时奉其父苏洵之命作《夏侯太初论》一文时所写的，“老苏爱此论”，苏轼自己也很满意，他在担任密州太守时所作的《颜乐诗亭诗并序》中，也曾引用过这些警句。在本赋中再用，堪称妥贴恰当。

本赋采用的是一种以小见大，小题大做的笔法。本赋文笔传神，老鼠之

黠，小童之惊，苏子之思，写得都很精准到位。在表现方法上，记叙、抒情、议论三者融为一体，情文并茂且寓意深刻。

秋阳赋

越王之孙，有贤公子，宅于不土之里，而咏无言之诗。以告东坡居士曰：“吾心皎然，如秋阳之明；吾气肃然，如秋阳之清；吾好善而欲成之，如秋阳之坚百谷；吾恶恶而欲刑之，如秋阳之陨群木。夫是以乐而赋之。子以为何如？”

居士笑曰：“公子何自知秋阳哉？生于华屋之下，而长游于朝廷之上，出拥大盖，入侍帟幄，暑至于温，寒至于凉而已矣。何自知秋阳哉？若予者，乃真知之。方夏潦之淫也，云蒸雨泄，雷电发越，江湖为一，后土冒没，舟行城郭，鱼龙入室。菌衣生于用器，蛙蚓行于几席，夜违湿而五迁，昼燎衣而三易，是犹未足病也。耕于三吴，有田一廛。禾已实而生耳，稻方秀而泥蟠。沟塍交通，墙壁颓穿。面垢落壑之涂，目泣湿薪之烟。釜甑其空，四邻悄然。鸛鹤鸣于户庭，妇宵兴而永叹。计有食其几何，矧无衣于穷年。忽釜星之杂出，又灯花之双悬。清风西来，鼓钟其镗。奴婢喜而告余：“此雨止之祥也。”蚤作而占之，则长庚澹澹其不芒矣。浴于暘谷，升于扶桑。曾未转盼而倒影飞于屋梁矣。方是时也，如醉而醒，如喑而鸣。如痿而起行，如还故乡初见父兄。公子亦有此乐乎？”

公子曰：“善哉！吾虽不身履，而可以意知也。”居士曰：“日行于天，南北异宜。赫然而炎非其虐，穆然而温非其慈。且今之温者，昔之炎者也。云何以夏为盾而以冬为衰乎？吾侪小人，轻愠易喜。彼冬夏之畏爱，乃群狙之三四。自今知之，可以无惑。居不瑾户，出不仰笠，暑不言病，以无忘秋阳之德。”公子拊掌，一笑而作。

【鉴赏】

此文是苏轼在颍州知州任上写的一篇知名的文赋。“赋”这一文体源于先秦，兴盛在汉魏，唐人也偶为之，发展到宋代时，又展现出散文化的方向。《秋阳赋》是苏轼文赋的代表作之一，体现了苏轼文已与诗和散文合流，赋既革新又复古的特点，也是苏轼倡导古文运动的代表。本赋采用了赋体传统的“主客问答”的方式，“主”即“东坡居士”，“客”即“公子”

(赵令峙)，首先从“公子”的话写起，通过四个排比句式，说明自己的“心”、“气”、“好善而欲成”、“恶恶而欲刑”四个方面皆似秋阳，所以，愿“以乐而赋之”。

在写作手法上，作者采用了赋体传统的“敷陈”（铺张）的手法。接着“居士答曰”，首先否定“公子”知秋阳；接着写自己才是真正知秋阳的。分两方面来写，首先写“夏潦之忧”以衬托，其次写“秋阳之乐”，末句以“公子亦有此乐乎？”结束此段，这一段话是全文的中心，表达了苏轼的观点。下文公子曰：“善哉”，肯定了“居士”上面一段话的正确性，承认自己对“知秋阳”的否定，接着退一步以“不身履”为自己解嘲，又用“可以意知”再与居士抗争。至此，公子气势渐弱，从文脉上来看，已从高潮快速下落。最后“居士”再从理性方面加以分析，说明“以无忘秋阳之德”，“公子拊掌”，心服口服，笑而无言，结束全文。全篇，结构完整；语句骈散相间，以散句为主，优美、自然、流畅。这是本赋的第一个特点。

第二，开头以析字引出有别于其他作者的文章，其妙清新，使文章增色许多。本赋首句：“越王之孙有贤公子，宅于不土之里，而咏无言之诗。”这个开头甚“奇”，初读之时不知所云，一旦解开其意，便顿觉其妙不可言。坡云：“且教别处使不得。”这里用的是修辞学之中的“析字辞”的“离合法”。“字有形、音、义三方面；把所用的字析为形、音、义三方面，看别的字有一面同它相合相连，随即借来代替或即推衍上去的，名叫析字辞”（陈望道《修辞学发凡》）。本赋首句中的“不土之里”离出“田”字，“无言之诗”离出“寺”字，然后合“田寺”为“峙”。原来是为了婉转交代“赵令峙”之名。这种“析字离合”开头法，偶尔用之，奇妙幽默、妙趣横生、引人深思，可是经常使用，又会使人感到油腔滑调如同猜谜语，因此苏轼说：“且教别处使不得。”

第三，本赋尤为突出的特点是采用了“反类尊体”的笔法。所谓“反类尊体”，也就是从相反的意思写起，接着再回到题旨上。本赋的题旨是描写“秋阳之乐”，即写秋阳的珍贵与欢喜。然而作者在写秋阳之前，生动细腻地描写了“夏潦之忧”。这一部分被分为两层来写，先写夏天霖雨不止，导致水患成灾：一个“淫”字很好地表现出雨量之大和落雨时间之久；一个“泄”字形象地体现出了大雨猛烈地暴落，舟船本行于江河，如今行于城郭，可见大雨成灾。

作者写道：禾结实却收不成，在雨地里生了芽，稻谷秀穗了却倒在泥水中，颗粒无收，望天长叹！缺衣少食，饥寒交迫，农村凋弊，生灵涂炭。这两

层生动细致地描写了“夏潦之忧”，可是这并不是文章的题旨或重点，目的在反衬下一部分的“秋阳之乐”。此时，作者的笔锋一转，描写久雨初晴的征兆：“清风西来，鼓钟其镗，奴婢喜而告予：‘此雨止之祥也！’”这只是一个过渡，然后饱蘸笔墨再“尊从本题”集中描写秋阳之出，文笔轻快，心情愉悦。当人们看到秋阳时，“如醉而醒，如喑而鸣。如痿而起行，如还故乡初见父兄”。一连用了五个生动形象且贴切的比喻，即所谓“连比”，深刻细致地表现了淫雨之后的秋阳给人们带来的快乐。

总之，这种写法是先忧后乐，以“夏潦之忧”，反衬“秋阳之乐”，使后者更加鲜明，更加突出，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，并且让读者能够在比较对照中领会题旨，受到感染，从而加强文章的效果。此外，从内容方面看，本赋也是极具特色的。传统的辞赋多写都市官苑，表现官宦贵族的生活和文人墨客的遭遇或愁绪，本赋却通过写水灾给民众带来的苦难，表现民众的忧乐，充分体现了苏轼关心底层百姓的仁德之心。

刑赏忠厚之至论

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、康之际，何其爱民之深，忧民之切，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！有一善，从而赏之，又从而咏歌嗟叹之，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；有一不善，从而罚之，又从而哀矜惩创之，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。故其吁俞之声，欢休惨戚，见于虞、夏、商、周之书。

成、康既没，穆王立而周道始衰，然犹命其臣吕侯，而告之以祥刑。其言忧而不伤，威而不怒，慈爱而能断，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，故孔子犹有取焉。《传》曰：“赏疑从与，所以广恩也；罚疑从去，所以慎刑也。”

当尧之时，皋陶为士，将杀人。皋陶曰：“杀之”，三。尧曰：“宥之”，三。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，而乐尧用刑之宽。四岳曰：“鲧可用”，尧曰：“不可。鲧方命圯族。”既而曰：“试之！”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，而从四岳之用鲧也？然则圣人之意，盖亦可见矣。《书》曰：“罪疑惟轻，功疑惟重，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。”呜呼！尽之矣。

可以赏，可以无赏，赏之过乎仁；可以罚，可以无罚，罚之过于义。过乎仁，不失为君子，过乎义，则流而入于忍人。故仁可过也，义不可过也。古者，赏不以爵禄，刑不以刀锯。赏之以爵禄，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，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。刑之以刀锯，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，而不施于刀锯

之所不及也。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，而爵禄不足以劝也；知天下之恶不胜刑，而刀锯不足以裁也，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。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，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。故曰：“忠厚之至也。”

《诗》曰：“君子如祉，乱庶遄已；君子如怒，乱庶遄沮。”夫君子之已乱，岂有异术哉？制其喜怒而不失乎仁而已矣！《春秋》之义，立法贵严，而责人贵宽。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，亦忠厚之至也。

【鉴赏】

苏辙《东坡先生墓志铭》说：“嘉祐二年（1057），欧阳文忠公（欧阳修）考试礼部进士，疾时文之诡异，思有以救之。梅圣俞时与其事，得公（苏轼）《论刑赏》，以示文忠，文忠惊喜，以为异人，欲以冠多士（第一名），疑曾子固所为（子固，文忠门下士也）乃置公第二。复以《春秋》对义居第一，在殿试中中了乙科。写下书信以谢诸公，文忠见之，以书语圣俞曰：‘老夫当避此人，放出一头地。’”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主要领导者，也是文坛的领袖。他提倡古文，反对“时文”（“骈体文”），不但以自己的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领导古文运动，而且利用职权推行这一革新主张。

嘉祐二年二月，欧阳修主管礼部考试，他决定，考试中写“时文”者一律不取，十分有力地打击了“时文”华而不实的文风，大大推进了古文运动。欧阳发《先公事迹》：“嘉祐二年先公知贡举，时学者为文，以新奇相尚，文体大坏。公深革其弊，一时以怪僻知名在高等者，黜落几尽。二苏出于四川，人无知者。一旦拔在高等，榜出，士人纷然，惊恐怨谤。其后稍稍信服。”

一、“引古咏叹”是本文非同凡响的一种开头方法。

二、“疑”字立骨，贯穿全篇。

“刑赏忠厚之至”，可以归结到儒家的“仁”字上，但这是浅而易见的表面。苏轼之文不落窠臼，揭开表面，深入实际之中，抓住“疑”字这一关键，“此长公（苏轼）应试文也，只就本旨，从‘疑’上全写忠厚之至”（《古文观止》）。本文以“疑”字立论，一字立骨，贯穿始终。当文章引用“传曰”（赏疑从与，罚疑从去）时，《古文观止》评曰：“当赏而疑，则宁与之；当罚而疑，则宁不致罚。就‘疑’字见出忠厚来，贯穿全文。”当文章引用“书曰”（罪疑唯轻，功疑唯重）时，《古文观止》评曰：“罪可疑者，则从轻以罚之；功可疑者，则从重以赏之。法可以杀可以无杀者，与其杀之，而害彼之生，宁姑生之，而自受失刑之责。”“疑”字成了全篇的骨架，在文章中发挥

极大的作用。

三、引经据传，凿凿有凭。

本文“引经据典”，除标题之外，共有七处之多。第一段两处，头一处是：“故其吁俞之声，欢休惨戚，见于虞夏商周之《书》。”此典见于《尚书·皋陶谟》，其中记载古代君臣对话，多用“吁”（表示慨叹）、“俞”（表示同意）等语气助词，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态度。这里主要指的是圣君贤臣们对“忠厚之至”的感叹！第二处“告之以祥刑”。语出《尚书·吕刑》：“王曰：吁，来！有邦有士（诸侯）。告尔祥刑，在今尔安百姓。”祥刑，慎刑。一说是善刑，即开明的法律。《吕刑》篇将周刑与苗族刑法做了对比分析，指出周刑仁慈宽厚。因此苏轼引为“忠厚”的例证。第二段共有四处：头一处，“传曰”，语出《汉书·冯野王传》；第四处“书曰”，见《尚书·大禹谟》（苏轼所引《尚书》，都指晋人梅賾伪古文《尚书》，那时还未发现它是伪书）。这两处文章前边已经谈过，都是为了说明本文主旨“疑”字而引用的。“四岳用鲧”，出自《尚书·尧典》，是为了说明对于可用之人和不可用之人都应宽厚待人。第三段有一处，所引四句诗，出自《诗经·小雅·巧言》，是为了说明“仁”的。从以上七处用典来看，都是为了强有力地衬托主题并表现主题，都是为了使入相信自己所论的内容是“凿凿有凭”的，从而增强文章的说服力，令读者信服。

四、行云流水，叠宕出新。

本文从第三段自然过渡，第四段是对第三段的进一步补充和说明，也是对其更深层次的引申。本文第四段，从“可以赏，可以无赏”到“故曰：忠厚之至也”，是全文中写得最流畅的段落，是苏轼的得力之笔。《古文观止》称赞说：“下乃畅发题旨，得意疾书，如滔滔江水，一泻千里。”李扶九评说：“公平生为文，如行云流水，行于所当行，止于所不可不止，虽嬉笑怒骂之词，皆可书而诵之。此篇灏气英光溢于简外，入后以‘仁’、‘义’二字畅论刑赏，于尺幅中具长江、大河之势，尤属千古无匹。当日因疑而抑其不冠多士，未免屈公文矣”（《古文笔法百篇》）。此段文字畅达豪迈，充分表现了苏轼“行云流水，无不尽意”的写作风格。

细读全文总是给读者不同的惊喜，一气呵成，而且“叠宕出新”笔法贯穿了全篇。全文步步“叠”，步步“宕”，复叠以砸实内容，振宕而出新意，犹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波浪滚滚，汹涌澎湃，奔腾而下，永不停息，而又当止则止，留有“馀波”。文章结构严谨而完整，议论深入而畅达，是一篇做工精美的好文章。